

所

谓现代新儒学，是指『五四』以来，在强烈的民族文化危机意识的刺激下，

一部分以承续中国文化慧命自任的知识分子，

力图恢复儒家传统的本体和主导地位，重建宋明理学的『伦理精神象征』，

吸纳、融合、会通西学，建构起一种『继往开来』、『中体西用』式的思想体系，以谋求

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的现实出路。它主要是一种哲学和文化思潮，同时也

包含着社会政治内容。

现代新儒学 与中国现代化

● 方克立 著 / 天津人民出版社

现代新儒学批判了『现代化即等于西化』的口号，

向往一条东方式工业文明即『儒家资本主义』的道路。七十年代以来日本、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等东亚国家和地区

经济迅速发展的事实，似乎是为『儒家资本主义』道路的可行性

提供了某种例证，因此这个学派学说在八十年代以来显得十分活跃。

103118

B260.7

1

DF02/108

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

方克立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

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

方克立 著

*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张自忠路189号)

天津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20印张 2插页 373千字

1997年11月第1版 1997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

ISBN 7-201-02867-7

B·98 定价:28.00元

自 序

本书是我十年来关于现代新儒学和中国文化问题研究的文字的结集。

我过去的教学与研究工作的，和大多数中国哲学史学界的同仁一样，重点在中国古代哲学。十年前在一次座谈会上即席作了“要重视对现代新儒家的研究”的发言，人们说“这个意见很好，你就来做这件事吧”，后来就把我推到了“现代新儒学思潮研究”课题组负责人的位置上。压上这付担子，可不同于在会上发几句议论谈点个人看法，而是必须真抓实干，几乎是从零开始在中国大陆重新组织和推动对现代新儒学的研究；并且必须把握正确的研究方向，如期拿出有一定学术质量的研究成果来，才能对国家和人民有所交待。十年来主要依靠集体的力量完成了这一课题的研究任务，我本人也在这方面增加了一些知识，随着课题研究工作的进展陆续发表了一些文字。与课题组内其他同志深入的专人或专题研究不同，我关注的问题要宏观一些，涉猎较广而对每一个问题的研究都不十分深入，研究也缺乏系统性，这是自

知其短的。但由于组织课题研究工作的需要,有些总体性问题甚或是涉及方向性的问题总得有人考虑,有人出来说话,这个角色往往只得由我来充任。所以,要从宏观上了解十年来中国大陆现代新儒学研究的始终伴随着思想论争的复杂曲折进程,我的这些文字可能还记录和保存了一些对后来的研究者有一定参考价值的资料。

我们一开始就意识到此一课题研究有着学术思想史研究和现实思想斗争两个方面的重要意义。课题工作是从中国现代学术思想史的角度来组织开展的,所以比较注意系统地编三代现代新儒家学者的学术资料,包括编“学案”和“论著辑要”,在此基础上分别进行较为深入的专人和专题研究。“课题组始终十分强调两点:一是要详细占有资料,准确理解原意,这是实事求是地进行科学研究的基础和前提;二是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现代新儒学进行一分为二的分析评论,既不盲目崇扬,也不抹煞它的贡献和历史地位。”^①这种研究态度得到了国内大多数学者的认同和不少港台海外学者的中肯评价,同时也受到了主要来自新儒家方面的批评。批评意见集中到一点,就是不满意我们强调在现代新儒学研究中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港台新儒家把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看作是大陆新儒学研究无法突破的“瓶颈”,认为“除非大陆学者能摆脱马列主义的教条和思想框框,他们对当代新儒学的研究

^① 《现代新儒学研究丛书·丛书主编的话》。

不可能有真正的突破”。在他们看来，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了，“将来中华民族的方向、历史运会的方向必然是彻底的唯心论”，也就是中国新儒家的哲学。继而大陆新儒家也指责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先定原则”和“门户之见”，认为“中国文化和新儒家思想在马克思主义派那儿，是没有原则意义，没有体的层位的”，因而欠缺同情的了解，不可能真正做到“实事求是”。他们把“大陆马列派”和“西方自由派”捆在一起来进行批判。新儒家首先在意识形态方面对马克思主义表示不能相容并采取了进攻的姿态。而在我们看来，要对现代新儒学这种思想文化现象作出正确的历史说明和进行科学的理论分析，离开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是根本不可能的。我们要坚持自信是正确的学术立场，把课题做下去并争取顺利完成，就不能对新儒家的批评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而是必须作出回应，因而难免发生一些思想交锋。作为课题组的负责人，这项工作我做的比别的同志要多一些，所以受到的批评也最多最直接最尖锐。这是不得已之事，但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因为各种批评均不无教益，而且也是对我们所持的马克思主义学术立场的磨砺和考验。

一旦涉猎中国现代思想史的研究领域，才体会到为什么人们常说这项研究工作难做把它视为畏途，为什么“厚古薄今”的选择对学者来说相对比较安全较少麻烦。但是我们又不能忘记本世纪的伟人毛泽东的指示：“对于近百年的中国史，应聚集人才，分工合作地去做，克服

无组织的状态。应先作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几个部门的分析的研究，然后才有可能作综合的研究。”^① 现代新儒学在近百年中国思想文化史中的地位是不容抹煞的，所以此一课题研究的意义和价值也是不容怀疑的；而且我们所采取的“聚集人才”、“分工合作”的研究方法也正符合毛泽东的指示精神，并已在实际工作中取得了明显的成效。这件事情总得有人去做，不论是谁去做，它都是我们这一代学者应尽的历史责任。

现代新儒学研究课题是在 80 年代的文化讨论中提出来的，它自然与回答和解决中国近现代文化讨论一贯之的主题，即中国向何处去、中国文化向何处去的问题，或谓古今中西问题（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中西文化关系问题）有着密切的联系，它不仅是一个思想史研究的课题，而且这一课题研究本身就是直接参与文化讨论，成为文化研究和文化讨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在现代新儒学研究中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对近现代文化论争、中国现代三大思潮及其相互关系的看法，每个研究者都要表明自己的文化立场，从正面提出自己的文化主张。在本世纪以来的诸多文化派别和文化观点中，我比较倾心于张岱年先生倡导的“综合创新”论，认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批判继承，综合创新”四句话可以简要地概括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本质，也最适合中国的国情，代表了中国文化发展的正确方向。这也是我近

^① 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

十年来关注和议论得较多的话题之一。我们和现代新儒家在文化观上的分歧，正是在于“综合创新”与“中体西用”的区别和对立。

收入本书中的文字，据内容特征分为若干组。第一组是关于现代新儒学研究的综论性文章，按照写作时间先后排列，大体上可以反映十年来大陆现代新儒学研究的基本进展情况，这些文章反映出我的认识也有一个从抽象到具体的深化过程。第二组是关于现代新儒家代表人物及其思想、著作的个案研究文章，大都是出席有关学术会议的发言，只涉及某些方面的问题，并非全面系统的研究。其中最后两篇是为了回答两位大陆新儒家学者1995年8月在武昌“徐复观思想研讨会”上对我的批评，阐明我们之间的思想分歧所在而于近期写成的，也属于个案研讨性质。第三组是为两套现代新儒学研究或资料丛书写的“总序”，以及为《孔子大辞典》写的有关现代新儒学的几个辞条。第四组是我近十年来参与文化讨论，就中国文化发展的方向、方针、方法问题所发表的一些个人意见，中心是阐扬“综合创新”的文化观，批评文化保守主义和文化激进主义，有关文字也大都与现代新儒学研究有一定的联系。最后附录了几位同志写的访谈录，其内容和前面的文章是基本一致的，可以互相参证。

需要说明的是，本书中有几篇文章是我分别与曹耀明、郑家栋、李翔海同志合作完成的。他们曾是我指导的研究生，现在都已成为在现代新儒学研究方面有多种论著出版的颇有影响的青年学者。有一套丛书“主编的话”

是我和李锦全同志合写的。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本书也是一项集体劳动的成果。“附录”部分更是包含了访谈和记录整理者的大量辛勤劳动在内。盛家林同志的提议、催促和帮助,天津人民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促成了本书的顺利编辑出版。对于上述同志的合作与友情,我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方克立

1996年12月28日于望京医院

DF94/27
08

目 录

自序	(1)
要重视对现代新儒家的研究	(1)
关于现代新儒家研究的几个问题	(17)
现代新儒学的产生、发展及其基本特征	(35)
略论现代新儒家之得失	(46)
第三代新儒家掠影	(54)
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	(64)
现代新儒学的发展历程	(91)
论现代新儒学对传统儒学的继承、开新及其 理论困限	(157)
展望儒学的未来前景必须正视的两个问题	(174)
现代新儒学研究的自我反省 ——敬答诸位批评者	(192)
现代新儒学的意识形态特征	(210)
现代新儒学发展的逻辑与趋向	(223)
现代新儒学研究在中国	(246)

梁漱溟非理性主义哲学思想述评	(261)
冯友兰与中国哲学现代化	(314)
中国哲学范畴研究的宏篇巨制	
——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评介	(328)
追求真、善、美的统一	
——从两位中国现代哲学家说起.....	(352)
杜维明新儒学思想述评	(362)
成中英新儒学思想述评	(382)
评大陆新儒家推出的两本书	
——《理性与生命》(1)、(2)	(401)
评大陆新儒家“复兴儒学”的纲领	(420)
《现代新儒学辑要丛书》总序	(443)
《现代新儒学研究丛书》主编的话	(448)
现代新儒家	(453)
儒学第三期发展	(456)
儒家资本主义	(458)
评“中体西用”和“西体中用”	(460)
在国际中国哲学学会第五届大会的发言提纲	(478)
大力宣传我们的文化主张——“综合创新”论	
——《中国文化与文化论争》读后	(482)
批判继承 综合创新	(488)
“综合创新”实已内涵有“辩证发展”的精神	(497)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	(500)

“文化中国”概念小议	(505)
评第二次文化热的“话语转换”	(513)
要注意研究 90 年代出现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	(519)
20 世纪中国哲学的宏观审视	(541)
20 世纪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回顾和展望	(554)

附录:

(一)现代新儒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访方克立教授

关 东(573)

(二)现代新儒学研究与文化讨论

——访方克立教授

汪先全 崔海教(588)

(三)批判继承 综合创新

——访南开大学方克立教授

王伟华(600)

(四)现代新儒学研究十年回顾

——方克立先生访谈录

邵汉明(607)

要重视对现代新儒家的研究*

在当前的文化讨论中,有一种观点颇为引人注目,并有进一步发展和滋蔓的趋势,这就是复兴儒学或所谓“儒学第三期发展”的主张。

“弘扬儒家学术”,“重建儒家的价值系统”,推动“儒学的第三期发展”,本来是 50 年代后期以来港台和海外的现代新儒家学者提出和一直坚持的口号。随着对外开放和海内外学术交流的发展,国内个别学者也接受了这个口号,并把“第三期发展”解释为儒家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的结合。近年来,一些海外华裔学者先后应邀回国讲学,也有人大力宣传这种新儒学的主张(并非人人如此,也不见得是多数)。曾经是现代新儒家的先驱者的几位长期生活在国内的老先生,怀着对“周孔教化”和传统儒学的“敬意”,重登讲坛,继续宣传当年鼓吹过的中国精神文明优越论,提倡发扬民族传统精神,甚至主张把宋明理学当作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一个重要来源。由于这

* 本文是作者 1996 年 3 月 27 日在国家教委召开的“七五”科研规划咨询会上的发言,原载《天津社会科学》1986 年第 5 期。

些都是知名度很高的学者,备受青年的尊敬和仰慕,加上报刊的宣传,因此,对于他们思想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学术观念的变化可能最能说明问题。近30年来港台现代新儒家著作中最常见的一些基本观念,诸如“天人合一”、“道德理性”、“个体人格”、“儒家人文主义”等等,过去我们是很少讲的,近年来纷纷出现于我们的报刊上和学术论著中,甚至成为最热门的研究课题和时尚观念。新儒学似乎已经成为现代学术思想战线上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派别,尽管目前国内还没有人公开打出“现代新儒家”的旗帜。

中国正处在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又一个关键时刻,现代新儒家思想的重新泛起,值得引起我们的注意。因为从历史上说,现代新儒家就是在中西文化冲突中,为了回答中国向何处去,中国要不要实现现代化和怎样实现现代化的问题而产生的一个学术思想派别,他们提出的理论,早已受到中国的前辈马克思主义学者的严肃批评,并且被实践证明是行不通的和根本错误的。在今天,中国更紧迫地面临着实现现代化的历史任务,古今、中西文化的矛盾冲突问题依然存在,而且更加直接、尖锐。中国是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呢,还是应该走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道路,抑或是走如某些人所鼓吹的“东方式工业文明”或“儒家资本主义”的道路?这是今天人们思考、探索和实际争论的问题。现代新儒家的主张在这个时候重新有了一定的市场,应该说是不奇怪的,甚至可以说是一件必然发生的事情。争取在不太长的时期

内,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绝大多数中国人民的强烈愿望。这个愿望能不能靠复兴儒学,或以现代新儒学为指导思想来实现?自然是一个重大的原则问题。在这样重大的原则问题上,我们的同志一般不会糊涂;但是在一些似乎是纯粹的学术问题上,例如怎样认识中国文化的特质,怎样评价儒家思想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和在今天的价值与作用,怎样解决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关系,等等,我们一些同志发表的见解,却很难和现代新儒家划清界限,有的甚至是径直地从港台和海外的新儒学著作中引进来的。这就容易在思想界造成混乱,特别是使一些青年同志在抽象的谈论中分辨不清是非。殊不知现代新儒家在上述“学术”问题上的观点和他们对中国前途的根本看法也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现代新儒家作为本世纪中国学术思想战线上重要的思想流派之一,我们过去对它没有做过系统的深入的研究,甚至缺乏基本的了解。对“五四”以来的前期“新儒家”思想,研究成果已属寥寥;对50年代以后在港台掀起的儒学复兴运动,现代新儒家的新的更重要的发展阶段,它的主要代表人物及其论著,国内人士更鲜有所知,也极少正面接触和思想交锋。以至今天人家的一些思想观点传播、渗透进来,那怕是在五六十年代泛滥的东西,我们都觉得很新鲜,有的人还把它当作新发明奉献给国内读者。其实,只要翻一翻现代新儒家的前辈们在解放前出版的著作,我们就很容易发现,这些思想观点有许

多并不“新”，不过是老调重弹或改头换面而已。我们的吃亏在于不太了解过去的历史情况，也不了解最近 30 年来港台和海外学术思想界的情况，所以难免认识不清。在当前的文化讨论中，在日益频繁的国内外学术交流活动中，许多同志都深深感到，目前的这种状况亟待改变。我们要重视和加强对现代新儒学的研究，弄清它产生的时代背景和发展的诸阶段，对其主要代表人物的思想和著作，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和评论，并且一定要把它放到中国现代思想斗争的总的潮流中来考察。经过若干年的努力，我们的认识当会更清楚一些。下面谈谈我的一些初步了解和看法。

现代新儒家是在本世纪 20 年代产生的以接续儒家“道统”为己任，以服膺宋明儒学为主要特征，力图用儒家学说融合、会通西学以谋求现代化的一个学术思想流派。因为区别于先秦儒学的宋明儒学，在历史上被称为“新儒家”，所以把本世纪以复兴儒学为职志的这个流派称为“现代新儒家”，或“当代新儒家”。先秦儒家，宋明新儒家，现代新儒家，这就是他们所说的儒家学术发展的三个阶段。现代新儒家所致力做的就是“儒学第三期发展”的工作。

19 世纪中叶以来，中国在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下，经济、政治、军事和社会的状况日趋恶化，“师夷制夷”的多次努力相继失败，这就使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逐渐意识到，为了找到中国从传统走向现代化的正确道路，就必须进行文化和社会的全面改造，特别是要对

支配整个社会意识形态的传统文化进行深刻的反思。于是，在“五四”前后出现了以打倒孔教迷信、提倡科学和民主为特征的新文化运动。这个时期的学术思想界非常活跃，出现了否定传统的全盘西化派，固守传统的保皇、保教和国粹派，以及各种形式的中西折衷、调和、会通派，展开了一场关于东西文化、特别是中西文化关系问题的持续数十年的文化论战。现代新儒家就是在这个时期应运而生的。它是中国人对于中西文化冲突的一种很重要的回应方式，即代表了在这个冲突中力图保持中国传统文化的本体或主导地位，并以此为基础来会通西学、折衷中西的一种努力。在一片西化声浪中，它勇于站出来维护传统；和顽固的保守主义者相比，它又并不绝对排拒西学。它表面上很“全面”、“公正”，实质上还是属于中体西用派，华夏优越论是其骨髓深处的精神支柱。这种中国本位的文化立场，比较容易为具有民族危机感而又不了解世情的中国人在感情上所接受。同时，我们也应看到，现代新儒家是现代中国思想斗争的产物，它是站在一定阶级的立场来维护传统、会通西学的，也就是说，对于中学和西学都是有选择的。它所维护的是儒家伦理本位和心性之学的唯心主义传统，所会通的也是现代西方的各种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从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到新实在论、新黑格尔主义等等。中国哲学（包括儒家哲学）中的唯物主义和无神论传统，它是视而不见也不可能去继承和发扬的；西方传来的马克思主义，它又视若洪水猛兽唯恐其深入于中国人民的心中。所